

李商隱 詩三百首譯賞

李 淼 / 長 春 出 版 社



李商隐诗三百首译赏

李 森 著

长 春 出 版 社



李商隐诗三百首译赏

李 淼 著

责任编辑：董辅文 张 樱

封面设计：王国庆

长春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重庆路40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长春市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1990年12月第1版

印张：20.25 插页：4

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

字数：452 000

印数：1—5 200册

ISBN 7-80573-269-8/I·44

定价：9.50元

前 言

李商隐的生平

虚负凌云万丈才，
一生襟袍未曾开。

——崔珣《哭李商隐》

徒嗟好章句，
无力致前途。

——喻凫《赠李商隐》

李商隐，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从祖父起迁居郑州紫阳（今河南紫阳）。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卒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公元858），终年46岁。一生历经晚唐宪、穆、敬、文、武、宣宗六期，主要活动时期是文、武、宣三朝，这是唐王朝由所谓“中兴”到走向末路的重要转折时期，是唐王朝日薄西山面临崩溃的前夕。在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的矛盾都变得空前激烈和尖锐。国势衰微，形势混乱，危机四伏，分崩离析，政治极其黑暗腐败，人民饱受苦难煎熬。昔日辉煌鼎盛的王朝濒临瓦解，再也无法摆脱垂灭的命运。李商隐就生在这样一个垂危时代，个人一生遭际始终坎坷潦倒，虽有凌云抱负和万丈才华，胸怀“殷浩当世的心机”，“欲回天地”，但陷入于那个污浊的社会漩涡中，理想和追求总是不断破灭，心灵总是负载着沉重的苦痛，他的一生是苦难的一生、悲剧的一生。“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袍未曾开”，“徒嗟好章句，无力致前途”，

是对诗人一生悲剧命运的最好概括。

艰难困顿的少年时期

李商隐出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和下级官吏家庭。看其家谱，其先世和唐王室同宗，即他的祖先和唐高祖李渊的祖先都是汉李广的十六世孙凉武昭王李暠的后裔，但并没有编入属籍，得到唐王朝承认，享受到和王室同宗的待遇。正如商隐自己所说是“宗绪衰微，簪缨殆歇”（《祭处士房叔父文》），式微的“王孙”，徒有其虚名而已。从诗人高祖李涉算起，到曾祖李淑恒，祖父李邕、父亲李嗣四代，都只做过县令、县尉和州郡幕僚一类低级官吏，而且都早逝，屡代孤寡，门庭日衰。高祖李涉，任美原县令。曾祖父李淑恒，任安阳县尉，祖父李邕任荊州录事参军，父李嗣任获嘉县令。曾祖淑恒曾是才华早露与贺知章、包融、张旭齐名号为“关中四子”的诗人，但年仅29岁就去逝。祖父李邕也是“以疾早世”。父亲李嗣在诗人九岁那年死去，这样一个日益衰薄的家庭，其生活的困窘艰难可以想见。

李商隐出生那年，父亲在获嘉县任县令，但诗人3岁时，父亲被罢县令职，改在浙江一带辗转作地方幕僚，生活极不稳定，商隐后来回忆这一段生活是“浙水东西，半纪飘泊”（《祭裴氏姊文》），道出其生活的流离动荡。父亲死后，九岁的诗人和母亲、姐弟运载父亲灵柩回到郑州荥阳。在荥阳待二年，父丧期满，全家再迁至东都洛阳。这时期，家境更趋艰困。孤儿寡母，家贫势弱，诗人描写这段生活是：“某年方就傅，家难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旌。四海无可归之地，九族无可倚之亲，既附故邱，便同逋骇，生人穷困，闻见所无。及衣裳外除，旨甘是急。”还是9岁孩子，家难就降临头上，四海难找归宿，九族难找可倚之亲，因为营葬父亲，为欠款而惊忧，还要奉养寡母，更是心焦烦愁，生活是何等窘迫和严峻。但是，

诗人作为长子，小小年岁便义无反顾挑起了生活重担，开始了他的拼搏和奋争，生活困顿没有难倒他，为了维持一家生计，他“乃占数东旬，佣书贩舂”，既为人抄书，又贩卖舂米，做短工零活。在历代诗人中，象李商隐这样真正从少年开始就象一般贫民那样靠出卖体力谋生者实不多见，这是值得注意的。正是这种穷困生活的磨炼，铸就了诗人坚强的性格，激发了诗人积极用功追求理想的决心。他虽然身处困境，但不消极、悲观，而是发奋读书，力图有所作为。他刻苦攻读：“某材诚菲薄，志实辛勤；九考非迁，三冬益苦。引锥刺骨，虽谢于昔时；以瓜镇心，不惭于先辈。”（《上河南卢尚书状》）寒冬酷暑，引锥刺股，因为他清醒地认识到只有走这条读书求仕的路才可有自己的前途和出路。他家政治上并不显赫，但也是式微的“王孙”，家庭重视文化教养，算得上是世代儒墨，书香门第。因此，商隐童年时期虽随父在浙江一带流离飘泊，辗转不定，但还是受到良好的教育，从小就读经习字，诗人在后来写的《上崔华州书》曾回忆说：“五年读经书，七年弄笔砚”，这说明诗人在童年时期就有了很好的基础，而到家欢骤至家庭陷入困境后，就益发激发了诗人刻苦学习的自觉性，更加扎实地在学问上下苦工夫。后来诗人在《与陶进士书》中曾谈到自己扎实读书的情况：“始仆小时，得刘氏六说读之，尝得其语曰：‘是非系于褒贬，不系于赏罚；礼乐系于有道，不系于有司。’密记之。盖尝于春秋法度，圣人纲纪，久羨怀藏，不敢薄贱。联缀比次，手书口咏。”这些回顾充分反映了诗人在少年时期那种好学不倦、扎实认真的精神。他读书不但“密记”，“怀藏”，而且“联缀比次，手书口咏”，这样扎实刻苦学习，使诗人在少年时期就学识宏博，基础深厚。逆境催人奋发，促人成长向上，商隐本来资质聪慧，又加上刻苦学习，其学问长进之大之快可以想见。而尤可欣喜的是他回到洛阳后，还遇到了一位良师，这就是隐居乡间的商隐的一位堂叔父，商隐称他

为“处士叔”。这是位对少年商隐影响极大的人物，无论学问、人品都对少年商隐以极为深远有益的影响，商隐后来回忆起他时，总是充满崇敬感激之情。这位“处士叔”是位入过太学，18岁就通五经的饱学之士，本可以顺利入仕，只因守孝道退学在家侍父多年，失去仕进机会，后来就索性隐居，疏于世事，淡薄名利，再不愿入仕。这位学问人品俱佳的处士叔对教育本家子弟都颇尽力。他不但精通五经，还擅长古诗、小学和书法，商隐和他的弟弟都就教于这位叔叔，从而在学问人品上都获益不浅。商隐博通经论，精于古文和书法，都归因于此。他的孤高耿介的品性也是与这位处士叔的影响有关。商隐后来回忆说：“樊南生十六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清楚说明，在自己发奋攻读和处士叔的培育下，商隐少年时期就已经学识宏富、才华杰出、不同凡响。商隐发奋攻读的目的很显然是为了应举入仕，以图重振门庭，为国效力，有所作为，但以后的生活表明，他的求仕的目的和追求却总是坎坷不达，他从小就造就的深厚学问更有意义的倒是对他成为杰出的诗人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尤为重要的是他的青少年时期的艰困生活在他心灵中烙下的创痕，成为一种潜在意识，一种强固的心理，这对诗人的创作也具有重要意义。从创作心理学的理论来看，一个作家少年时期心理、情绪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常常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无形中渗透在他终生的创作活动中，决定他的作品风格和个性特色。商隐诗歌的忧患主题及感伤风格和商隐少年时期的艰难困顿生活所形成的心理是分不开的。

坎坷蹭蹬的十年京师应举时期

商隐在16岁以后就开始应举，但到中进士差不多用了十年时间，即从文宗太和二年(828)到文宗开成二年(837)，这十年可作为商隐生平的第二个时期。可悲的是，和少年时期一

样，青年的商隐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在理想追求和爱情追求上仍是困顿不顺，现实对他竟是这样无情。青年商隐步入社会刚想展翅奋飞，就屡遭挫折，应试落选和初恋不幸，这两方面的沉重打击都降临到这个年轻人头上，使商隐漫长的十年青春生活罩上沉重的暗影，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说：“雀燕固寂寂，雾露常冲冲。垂兰愧伤暮，碧竹惭空中……终南与清都，烟雨遥相通，安知夜夜意，不起西南风？”雾露重重，烟雨漫漫，这就是商隐青年时期生活的写照。

商隐开始应举走的是唐代士人都走的“温卷”的道路。就是以文章求得名流赏识，获取声望，为考试中选创造条件。商隐主要“以古文出诸公间”，和杜甫等人献赋近似。他的温卷道路应该说还是开端不错的。他得到了当时的朝廷元老和骈文名家令狐楚的知遇。商隐18岁时就被这位当时任天平节度使的令狐楚辟为巡官。这位老人对商隐的扶植是极尽力的。不但给他巡官职位，还亲自教他骈文章奏的写作，使他很快就成为骈文名家。诗人对这位老人的知遇、扶植、奖掖、提携是终生感怀不尽，始终牢记其恩情的。但是，从客观上对商隐一生的利害得失的影响看，商隐得到这位当时牛党的骨干人物的赏识究竟是幸还是不幸却是值得推敲的。不如说，这个有幸的开端恰正是不幸的开始，因为这正是商隐陷入党争漩涡的第一步。而从初次应举的落选的实际看，似乎也很说明商隐的“温卷”之路并未成功。他和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一起应试，令狐绹考中，他却名落孙山。为什么未中？商隐自叙是为“贾相公（贾餗）所憎”。而且第三年再考，又“复为崔宣州所不取”，这二位考官不取商隐原因具体不详，但与商隐出身寒微和令狐楚在这二次应试中未予大力相助是分不开的。这里表明一个事实就是决定是否中选的关键不在应试的才学而在显要的提携，这个事实对青年商隐来说不能不是沉重的一击，使他预感到出身寒门的他的前程将是如何茫茫难测。他的《夕阳楼》一诗：“花明柳暗绕天愁，上尽重城

更上楼。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道出了心中的忧虑。但商隐毕竟是血气方刚的青年，应试的打击并未使他消沉，相反，还是满怀信心。他曾在给令狐楚的信中说：“倘蒙识以如愚，知其不佞，俾之乐道，使得讳穷，则必当刷理羽毛，远谢鸡鸟之列；脱遗鳞鬣，高辞鱣鲋之群；逶迤波涛，冲喉霄汉。”以一飞冲天的鲲鹏自诩，充满壮志豪情。商隐这种壮志不凡的胸襟抱负十分突出，值得注意。他在《安定城楼》一诗中也有明确表露，就是要“欲回天地”，做出扭转乾坤的大事业。不凡的理想抱负成为商隐不畏打击坚持进取的动力，使他总是壮心不已，这种坚毅不拔的品格是青年商隐性格的重要方面。与此同时，抱负不凡高自矜许，也使青年商隐具有豪放不羁、自由勇敢的个性，这种个性表现也十分鲜明突出。可惜的是后世研究者却往往不大注意这一方面，他们过多地注意了商隐忧郁内向的性格表现，从而未能全面说明青年商隐性格个性。不错，商隐确是常常抑郁，内心有太多的痛苦和不平。但青年商隐在行动上绝不乏勇敢与活跃。他的思想的开放，言行的大胆无拘束表现于多方面。他绝不是那种谦谦君子，温文尔雅，谨小慎微，相反，他完全可以说属于激进的一派。敢于宣扬异端思想，敢于激烈批评朝政，就是极突出的表现。比如，开成二年他给崔华州上书，就显得言谈大胆激进，很有离经叛道气味，终唐一代这种大胆言论再找不出第二人。他在书中说：“始闻长老言，学道必求古，为文必有师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谓道，岂古所谓周公、孔子者独能耶？盖愚与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系今古，直挥笔为文，不爱攘取经史、讳忌时事。百经万书，异品殊流，又岂能意分出其下耶。”蔑视偶像，不屑周孔，反对尊经，提倡独创，这种对儒家正统大胆批评的异端精神，充分显示出青年诗人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勇敢无畏。言谈的大胆激进也表现于诗人早期诗歌创作上，青年诗人早期的诗歌多为直接批评朝政的政治和借古

讽今的政治咏史诗。如有关甘露事变的《有感》、《重有感》，以及《陈后宫》、《览古》、《富平少侯》乃至《行次西郊一百韵》等，都是直接批评少年皇帝唐敬宗，指事陈情，激切慷慨。甘露事变发生时，白居易尚在。但其表现就大异于商隐，显出置身事外的态度。和商隐大胆抨击宦官直接批评皇帝相比不可同日而语。敢于仗义执言，绝不畏惧打击迫害，商隐这种勇毅的品格在青年时期就已养成而且一直坚持不变，这在以后的生活中也多有表现。商隐在青年时期，曾学道玉阳，也可以看作是他豪放不羁性格的表现，正是学道玉阳，使他受老庄思想侵染，更增强了他追求个性解放的决心。他学道玉阳，与女冠的接触交往也是商隐自由奔放性格的表现。关于商隐和女冠的交往和恋情，由于无确凿资料，难以作明确结论。但以商隐的诗为依据，结合当时士人比较放纵的风气来看，商隐和女道士中一个姓宋的发生了恋情纠葛是大体可以确定的。商隐的《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诗中有“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之句，《别智玄法师》中也有“云鬓无端怨别离，十年移易住山期”之句，都可说明商隐和女道士之间的关系确是相当亲昵的。青年商隐仕途不利，而学道玉阳，而钟情于女道士，无足为怪。从商隐多篇写女冠的诗来看，商隐对女道士的美艳和凄苦的生活多有真切描写。诗人多用神奇浪漫笔法赞颂女冠，也可见出诗人青年时期的风度。和女冠的交往自然是在重重压力下的心存忧惧的接触，“偷桃窃药”道出其交往接触的暗昧性质，幽会见面都极不易，在礼教束缚下与女道士相恋只能是忧畏重重。这样的恋情很难有好的结局。商隐不少无题诗所表现的遇合良难的爱情，相思的愁苦，应该说和商隐这一段留下极深创痛的恋情有关。除了和女道士的交往外，商隐在洛阳和柳枝的恋爱充分见出商隐自由解放的个性。商隐和柳枝的恋爱是以诗为媒的自由恋爱，他们自然地相悦相引，自由地结识交谈，并且勇敢地决定，自主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私订终

身。从《柳枝》诗序那些动人的描写来看，这真是纯真美好的爱情，两位青年男女主人公天真无邪、圣洁高雅的形象感人至深。但是可惜的是这次美好的初恋也以不幸分开而告终，商隐心爱的姑娘最终为东诸侯取去。这种不幸结局对商隐的打击的沉重可以想见。青年商隐的初恋，无论是与女道士的恋爱还是和柳枝的恋爱都以不幸告终，留给诗人的只是辛酸的回忆和深深的创痛。毋庸置疑这正是商隐大量感伤的爱情诗产生的基础。商隐的青年时代的奋争，无论是应举，还是初恋，都不美满，都很可悲。此外，还有一件事也同样是以高兴始以不幸终。这就是另一位知遇崔戎对商隐的赏识。在商隐第一次应举落选后，崔戎给苦闷的诗人以最大的温暖和支持，招聘商隐为幕僚，对他极为器重，可惜时间是那么短暂，赴任不到几个月，崔戎便病故。命运对于青年诗人竟是这样冷酷，青年商隐十年奔波于京洛，就是这样饱受颠簸之苦。但虽如此，也未能动摇诗人奋争的决心。血气方刚的青年更多的还是自信，还是勇敢的进取、奋争，他满怀创痛、不平和郁愤在艰难的人生长河中拼搏，态度始终是积极的。勇敢奋争是青年诗人基本性格特色，也是贯彻商隐一生的特征，虽然有时也有过消极的想法，但表现于行动的却总是不断奋进。终于，在开成二年（公元837），他第三次应举时，还是靠令狐绹的关系，考中了进士。诗人心情无疑是高兴的。然而，考中进士只是入仕的第一关，这一关的迈过几乎费时十年，几次起落，好不容易。这一事实本身已足够表明出身寒微没有可靠后台应举入仕是何等蹭蹬坎坷。商隐是何等地努力才中了举啊。他与令狐楚一家特别是与令狐绹的关系的复杂情况应该说已明显可见。这显然不是那么十分友好的关系，不即不离，若即若离，令狐绹对李商隐的态度几乎一生都是如此，门第的高下、地位的悬殊决定了事情只能是这样，很难再去苛求令狐绹。他不是也还不错吗？中举还不是靠他吹嘘吗？因此，中举以后，商隐对令狐楚

父子是感激的。他曾给令狐楚写信，感恩戴德，感激涕零。但这样中举实际也还是可悲的。商隐虽然高兴却并不乐观，他似乎预感到前程仍然茫茫难测，在《及第东归次灞上却寄同年》一诗中就表现了诗人的忧虑，他预感到应举以后的入仕也将是风云重重。

徒劳奔波的十年京师求仕时期

事实正是如此。中举到入仕还是有着遥远的距离，对商隐这样出身寒微的人来说，这一段路程仍然是崎岖艰危的。商隐中举历时近十年，可悲的是，他中举后在长安求仕又同样是历时十年最终仍是以不幸告终。以长安为中心的求仕活动时期，是商隐生平的第三个时期。是商隐陷入党争中成为可悲的牺牲品的时期。不断奋争的商隐在这一时期更倍尝生活的冷酷辛酸，倍感人世的严酷可怖。岁月蹉跎，一晃就是36岁，但十年京师，“樊南穷冻”，长安之大，竟然没有商隐栖身之地。

商隐中举以后不久，十一月令狐楚就病故。商隐赴兴元，遵楚令代草遗书，旋随楚丧还长安。回到长安后，因为令狐楚已死，失去了有力的庇护者。正在此时涇原节度使王茂元却赏识商隐，聘为幕僚。和商隐同科中举的好友韩瞻也同在王茂元幕府。韩瞻已是王茂元婿，不久，商隐也娶了王的女儿。这个时期，可谓商隐最得意时期。从他所写《漫成三首》的情调的欢快可以想象当时自负乐观的心情。但是，同样是好景不长，商隐投身王幕并就婚王女，从此就可悲地陷入了当时的牛李党争。商隐原来投身的令狐楚父子是牛党，而现在投身的王茂元却是李党。而当时两党正激烈地争斗，商隐由牛党投身李党，尽管诗人不以党徒自居，但也必然会受到牛党的攻击，这种打击很快就降临头上。商隐在中举后还需参加“释褐”考试，才可受命入仕做官。显然是由于牛党排挤，商隐参加“释褐考试”落了选，这对正在欢愉的商隐可谓击一猛掌。“释褐”落

选使诗人又陷入苦闷。他怀着悲愤感怆的心情写下了著名的诗《安定城楼》，抒发了自己壮志满怀而不得用世的痛苦感情。又过一年，商隐才“释褐”考试入选，授秘书省校书郎。这一职位品级并不高，但向来被视为清要，由此可登首辅。但可惜又是不到一个月，秘书省的席位还未坐暖，很快他又被外调为弘农县尉，唐代重京官轻外职，何况又是从秘书省外调为县官中最低的县尉，只负责治安，事务琐碎尘杂。这样的外调对商隐无疑又是一次极大打击。看来他实在是命多崎岖曲折。对此，商隐曾写《别薛岳宾》一诗抒发愤慨。到弘农县就职以后，商隐是克尽职守的，并为官公正，为减轻蒙冤犯人判刑，他和上司陕虢观察使孙简意见不一，而得罪了孙。商隐便又一次表现出无畏的性格，辞职不干，请假返京。写出了著名的《任弘农县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黄昏封印点刑徒，愧负荆山入座隅。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绝不奴颜卑膝，屈身辱志，表现出铁骨铮铮，再一次显出诗人勇毅斗争的品格、奋争不屈的精神。离开弘农县回京后，政局发生变化，文宗病卒，武宗即位，重用李德裕一派人物。商隐岳父王茂元也从涇原节度使进京为朝官。商隐也在长安与妻子欢聚，并准备再参加外官内调考试入选，重入秘书省。不过，商隐命运总是多蹇。就在这年冬天，诗人的母亲又病逝，商隐需回乡服丧三年。一去三年，过着闲居日子，这一时期，诗人写了多篇关于乡居闲逸生活的诗，表现了农村生活恬静安逸的清新美。但诗人用世之心始终炽烈，绝不忘情京师而渴望早日入仕。《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一诗充分表现了诗人这种关注国事的深情和急于入仕的愿望。但可悲的是待到商隐服丧期满重又返京时，时局又有变动。武宗李炎于会昌五年逝世，宣宗皇太叔李忱即位。他一反武宗政纲，上位即大贬李党。宣宗本来不满李德裕，不久就把李德裕一贬再贬，直至病死崖州。相反，过去被武宗放逐的牛党官员则先后召回，加以重用。在这种政

局下，商隐重入秘书省擢升京职的愿望又一次被击得粉碎，他真正成了党争的可怜牺牲品。《流莺》诗和《蝉》真切地抒写了诗人“飘荡”、“参差”、无枝可依、“徒劳恨费声”的悲愤心情。十年一度，实际只做了不到一年弘农县尉，最终也未在凤城栖得一枝，诗人是何等悲愤不平可以想见。可悲的正是这种无辜遭殉。关于商隐对牛李两党的态度，旧史家诬商隐背恩弃义，这一点今天早已有公正评价。商隐绝不是参与党争、以某一党徒自居之人。史料充分证实他与两党不少人都友好，他不是那种攀附某党屈身辱志的人。他是完全站在党争之外以朝廷国家利益为最高标准去评价时事的人。他之高度赞扬李德裕就是因为李德裕的政见在商隐看来是正确的、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可悲的是这种党派之争难定是非，而商隐又出入于两党，他只能成为牺牲品而无可辩冤，这个问题即便是今天，也只能是作大体的结论。关键的一点是商隐的万丈雄才确是因这种党争而粉碎，这是最可悲的。而在这种重重打击降临时，商隐虽然身陷痛苦深渊，却仍然始终铁骨铮铮，他象对刘蕡一样，对李德裕的被贬，也同样敢于仗义执言。这种始终不改的无畏精神才是最可钦敬的。

天涯飘泊的幕府生活时期

十年京师应举，十年京师求仕，商隐以整整二十年的最好年华苦苦奋争，却终于未在皇皇京都找到一席栖身之地。宣宗执政后更彻底粉碎了商隐的幻梦，在京都都是牛党要人充斥之时，商隐当然不可能再滞留了。宣宗大中元年，牛党进一步排挤李党，李党被纷纷外放。商隐跟随李党外调也就是势所必然的了。这年，李党的给事中郑亚外放，出为桂州刺史、御史中丞、桂管防御观察使。辟商隐为幕僚，对商隐优礼以待。商隐从此开始了远赴南国的天涯飘泊生涯。这样的远居外乡的幕僚生涯对壮志在心的商隐来说只能是不得已的出处。商隐是深知

前途暗淡的，而且还要离开娇妻爱子，其心情的萧瑟抑郁可以想见。即便是府主礼待甚高，也无济于事。因此，整整一年的桂管幕僚生活，诗人始终是在怀乡念远的感伤心情中度过的，美丽的桂林风光也激不起诗人丝毫欢欣，“情以物迁”完全变成了“物以情迁”，蒙上诗人主观情绪色彩的桂林风光是一片荒凉凄厉险恶的景观。诗人此时期所写多篇有关桂林风光的诗，如《异俗》等，呈示的多是巫鬼、坎井、虎狼之类光怪陆离的可怖景色。诗人日夜想念是故居家乡，一些真挚深情的怀乡诗是这一时期的诗歌佳作。在桂管不到一年，郑亚又再次被贬，商隐自然也跟着失职，由桂林北归暂回京都。大中二年（848）参加冬选，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尉，不久又改为京兆尹参军，职典章奏。但在京师的职司是乏味无聊的。大中四年（公元850），卢弘正（又有作卢弘止）前往徐州勘乱，辟商隐为随军幕僚。商隐素有从军建业之志向，对卢弘正之辟便欣然认诺，并又燃起雄心。对此，诗人在一封书信中说出了自己的心情，清楚道出了他为什么要就徐幕的由来：“某，幸承旧族，早预儒林，邺下词人，凤蒙推与；洛阳才子，滥被交游。而时亨命屯，道泰身否，成名踰于一纪，旅宦过于十年。恩旧凋零，路岐凄怆……去年远从桂海，来返玉京，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隘佣蜗舍，危托燕巢。春晚将游，则惠兰绝经；秋庭欲扫，则霜露沾衣。勉调天官，获升甸壤，归唯却扫，出则卑趋。仰燕路入长怀，望梁园而结虑……”在京师的生活拮据，和对未来军职生活的向往就是商隐又决心离京赴外的原因。商隐在徐幕的确精神振奋，心境较好。卢弘正的器重又激发了他的乐观自信。此时期所写的诗《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偶成转韵七十二句赠四同舍》抒写了诗人当时的心情。

“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诗人昂扬神态耀然可见。诗人的《晚晴》诗所抒写的轻快情调也见出诗人的振奋精神。但可惜，又是好景不长。似乎已成规律，凡是器重商隐的

人往往短命。就在大中五年（公元851）冬天，卢弘正又逝世。而且接踵而来，妻子也病亡。连连的沉重打击，真把诗人置于死地。从此，商隐才真正陷入了绝望，几乎失去了奋争的勇气了。商隐从始沉浸于佛教。他在《樊南二集序》中说：

“三年以来，丧家失道。平居息息不乐，始克意事佛。方愿打钟扫地。”凄怆之音令人心酸。人世是这样痛苦，命运是这样不幸，一次又一次沉重打击袭来，任谁也难以承受这样的不幸。在这里我们不必去评断这是什么颓伤消极，而只能深深感到悲愤，为诗人不幸掬同情之泪。商隐此时期所写真挚感人的悼亡诗发自深衷感人至深，表现诗人至性至情，都是优秀诗作。大中五年七月（公元852），是诗人第三次远赴东川任幕职。柳仲郢以河南尹调任梓州刺史、东川节度使，辟商隐为幕书记。诗人在妻死后将儿子寄居京师而远赴东川，其心情的愁郁自可想见。但商隐虽极度悲苦，却仍始终不忘怀现实。他在此时期写了多篇咏史诗，抒写忧时伤国情怀，其辛辣尖刻仍不减当年。他为人的纯真至性尤感人至深。他是那样挂心寄养京师的衰儿，听到京都来人见到自己的孩子，他是那样惊喜，对可怜的儿子是那样心疼关注，其深挚之情感人肺腑。诗人对亡妻也忠贞不渝，断然拒绝重娶，充分说明其品格的严肃坚贞。诗人的爱情诗始终显出高格调正是诗人为人品格的体现。大中十年（公元856）柳仲郢调赴京职还朝，商隐也返回长安，辟为盐铁推官。大中十一年（公元858）罢职，回郑州家居，不久病逝。享年仅46岁。《幽居冬暮》是诗人绝笔。诗人直到生命终止还为不能“匡扶”国运实现夙愿而悲愤不已，其高尚情操将永垂青史。诗人一生是不幸的一生，奋争的一生。污浊的社会毁灭了诗人理想，给诗人以毕生的苦痛，但怨愤孕育了诗人的伟大诗篇，给予了诗人不朽的生命。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

李商隐流传下来的诗歌约 600 首，这些诗歌大体可分为三类。首先是抒写诗人自己理想抱负、表现诗人品格节操和自伤失意身世的诗最多；其次则是触及时政的政治诗；再一类就是爱情诗。这样分类只是大致的剖分，因三类诗并不是截然分立而往往互有相通的内容。自伤仕途失意坎坷，分明有政治内涵；激烈地抨击时政，也分明是诗人耿介操守的表现；爱情诗寄寓身世之感更是显而易见。但从主体内容看，大致分为三类还是可以的，分得开的。对这三类诗，解放后许多研究者以当今的批评标准评价，都首先极力肯定商隐的政治诗，有的研究论著对此作了极详尽的论析，对商隐政治诗反映时政的广度深度的剖析可谓精微透彻，这是商隐诗歌研究的新成果，是应肯定的。但是，过分估价商隐政治诗的价值，认为只有政治诗才是商隐诗歌“最有思想光辉的部分”，这样去肯定商隐诗歌的最高成就，却不能说是恰当的，是并不切合商隐诗歌的实际的。因为，实事求是地看，千百年来商隐诗歌深入人心脍炙人口的主要还是那些哀感缠绵、刻骨铭心的伤怀诗和爱情诗。我们对商隐诗歌研究必须注意实事求是，注意去掉庸俗社会学的政治第一的批评标准的影响，以还其本来面目。

商隐的政治诗数量约一百多首，占商隐全部诗歌六分之一的比重，也不乏优秀诗作，确不应忽视。但这些政治诗的主要价值是在揭露腐朽现实，由于历史局限，诗人的政治观点虽具进步性，但其主张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因而很难说有多大的“思想光辉”。因为商隐主张的那些思想，如反对宦官乱政，反对藩镇割据，主张任贤选能，显然并非什么高论。诗人在那时不可能找到解救危机的道路，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少数贤君圣相身上，这种“系人不系天”的观点具有进步意义，但显然仍是一种唯心史观。我们只能实事求是予以恰当估价，而不